

竺可桢逸闻趣事若干

◎ 两浙人物 □ 叶胜舟

竺可桢对学术讲演要求严格,言出有物,论必有据。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黄国璋屡次请他来所讲演,总为其婉拒,就让谢觉民去请并想知婉拒原因。竺正色对谢说:“你们是研究所,不能随便讲的。你回去告诉黄所长,给我三个月时间,讲一次好了。”三个月后,竺如期到所演讲,演讲文章还发表在地理所的《地理》刊物上。(谢觉民《忆吾师竺可桢——为纪念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》)

竺可桢以精益求精的态度,考证有些诗人“但求字句之工,不求事实之正确”“不顾事实而顾自己的便利”。例如质疑唐朝钱起的诗《赠阙下裴舍人》首句“二月黄莺飞上林”失实,“在长安二月间决无黄莺”,因为“唐代首都长安,黄莺是一种候鸟,至少要阴历四月底才到长安,这句诗里的景色,无疑是杜撰的。”(竺可桢《科学之方法与精神》《利害与是非》)

1940年底,教育部长陈立夫到遵义视察浙大,竺可桢接待很简单,既不摆宴,也不送礼,只让陈部长自行到各处走走看看,然后作一次演讲。陈在演讲中批评浙大学生校纪不严、校风不佳,“在一处地方见到很多烟蒂,学生居然吸烟成风”。坐在陈立夫旁边的竺可桢一听,马上插话反驳:“个别学生吸烟是有的,要说‘吸烟成风’,这是夸大的,因为这里生活条件很艰苦,学生手里没有钱,不可能都去买烟吸。”

竺可桢经常检讨自己,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甚至自责“可耻”。例如1936年,与朋友们一起贺陈布雷母亲七十冥寿,他在日记中补注“至今思之可耻之事”,1962年,参加科学规划综合组会议,他到会才拿到讨论提纲第二稿,没时间仔细看,发言时“提意见关于农业支援提的不够,但实际最后部分已大大扩充”,在日记中反省“既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也随便乱发言,可耻之至。”(《竺可桢日记》,1936年10月14日、1962年9月6日)

浙大1940级史地研究所研究生叶笃正在建国初期,协助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竺可桢处理学会的工作。有一次,他为一件具体工作提醒老校长,竺不仅采纳了学生和下级的意见,而且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。(叶笃正《竺可桢全集》序)竺可桢的最后一部著作《物候学》深入浅出,生动活泼,是把专门学问写成科普著作的范例;1961年写的一篇《向沙漠进军》,曾被选入中学语言教科书中。(施雅风、许良英《竺可桢传略》)

他对孩子有宽容的一面,尊重孩子的爱好和择业,自己是卓越的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,6个子女没有一人继承他的专业;也有严肃的一面,要求读小学的小女儿竺松“每天上学放学时,从什刹海旁走过,注意观察一下,哪天冰开始融化”“哪一天什么树开什么花,你也留心一下”,而且“不能马虎虎的”“不要开玩笑”。(强江海《父亲竺可桢:爱得刚刚好》)

他有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,年轻时即掌握英、法、德三种外语。解放后,年过60的竺可桢为方便直接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经验,又开始学习俄语,除了听广播俄语讲座,还请一位俄籍家庭教师每周两晚辅导。“不服老、坚持了数年。有志者事竟成,他终于能阅读俄文科技资料了。”(陈汲《我的丈夫竺可桢》)



1939年,竺可桢(前排左3)与贵州浙大校友合影

竺可桢历来守时,主张开会紧凑扼要。但他的哈佛老同学、浙大理学院院长胡刚复话匣子一打开,就滔滔不绝刹不住车。浙大师生都摸到规律、尝到“苦头”,午饭时间远远看见胡院长都退避三舍,就怕万一被他逮住,说起来没完没了,中饭都吃不成。

有一次,胡刚复在纪念周集会上演讲,老毛病复发,快到中午吃饭时,还滔滔不绝。台下听众已不耐烦,三五成群,交头接耳地开小会。竺校长几次给他打手势,希望快点结束,可他还是“再讲几分钟”地一拖再拖。竺校长忍无可忍,当头棒喝,说出大伙心声:“你是物理学家,怎么开会讲话不用物理时,偏用天文时!”一把将胡院长拖下台去,台下一片掌声和笑声。多年后,浙大校友记不住胡院长到底讲了什么,唯独竺校长这句话记得十分清楚。(吕洪年《竺可桢校长二三事》)

他祖籍浙江绍兴东关镇(今属上虞区),和宋庆龄一样家乡口音很重,英语比国语说得更流利,所以有不少相关的趣事。20世纪80年代,美国浙大校友每年有两次聚会,聚会的压轴戏是由一位会口技的同学,用绍兴口音模仿竺可桢讲话,校友们听了乐开怀。

竺可桢对浙大学生演讲,有两句口头禅:“因此的话”“这个的话”。与他同乡的谢觉民听力无碍,外省人就惨了。谢的女友阖家赏是安徽合肥人,也在浙大求学,后一句口头禅就听成为“贼骨头哇、贼骨头哇”,真是差之毫厘,去之千里。(谢觉民《忆吾师竺可桢——为纪念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》)

1947年初,竺可桢访美时遇见多年不见的哈佛同窗、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。赵大师一听他说话乡音依然如此重,就责怪:“你怎么还是不改说国语呢?”接着很有把握地说:“我来教你,保证三天就能学会。”可是第一天下来后,赵就泄气地嚷嚷道:“不可教也,不可教也。”很快死了这条心。(竺安《回忆父亲竺可桢》)

浙大1935级电机系学生刘奎斗是辽宁人,聆听竺校长训话,“他的家乡口音比较重,实在使我这北人无法完全听懂,但是训话中诚恳、慈祥的态度,以及一再说到母校

校训‘求是’,令我永铭于心”。刘奎斗两次进出浙大、两次投笔从戎、两次勇赴国难,竺可桢称赞不已。

刘奎斗1937年秋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,11月带领浙大学生洪珉、程羽翔等11人参加浙东战场游击队,一律委任为上尉训政员。1940年随第5军参加著名的昆仑关大捷后,初秋返校在机械系复学。1942年夏毕业。1943年春又加入远征军,竺可桢特杀一只老母鸡为他饯行,紧握他双手久久不放,企盼凯旋。

1944年3月9日,新编第22师战车第1营在緬北瓦鲁班之役中攻破日军第18师团司令部,缴获敌师团关防大印。刘奎斗时任战车第1营补给连连长,缴获敌两辆装甲车,因此荣获六等云麾勋章、升任战车指挥部参谋主任兼技术部主任。战后他盖了一个关防印模随函寄给母校报喜。

竺可桢将刘函和印模张贴在学校布告栏内,校园沸腾。他又在日记中写道:“緬甸孙立人将军兵士入瓦拉本,获敌十八师团关防一顆,殆即刘奎斗君所云是也。”又据刘奎斗致程羽翔函,描述了刘此役战功,“刘所带的是四十辆卡车和四辆指挥车,在森林冲出一条路,与敌战时,全不见敌人。但冲过时压死敌人五十余”。(《竺可桢日记》,1944年3月9日、4月10日)

1997年浙大百年校庆之际,曾任台湾浙大校友会会长的刘奎斗卖掉自己1200平米土地,将所得200万美元全部捐赠母校建造国际教育大楼,始终不同意以他的姓名冠名,而以“竺可桢”冠名,同时捐赠建造竺可桢纪念馆,以此表达对老校长的深情与敬仰。此后得知建设费用不足,他又拿出全部积蓄追加捐款60万美元。他乐捐善款,甘守清苦,2000年5月回母校参加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落成典礼,“穿的毛线衣肘部有一个四五厘米的破洞,他却不以以为然”。还说,“我不是富翁,只是几十年在国际商贸活动中节俭从事,积累了一些资金”,“我不想把积下的钱给子女,而是乐意捐给母校建造大楼,以便唤起后学对敬爱竺校长的崇敬。”(杨达寿《爱国爱校爱竺公的典范——纪念浙江大学名誉教授刘奎斗先生百寿寿辰》)

八个人,坐在一个小教室里。抗战期间,条件很差。佩弦先生的课,需要引用的资料很多,这些全都由他自己写在黑板上。两堂课里,黑板总是擦了又写,写了又擦,弄得他两手白粉,甚至累得两颊泛红。不论板书、讲课,从来都是有板有眼,一丝不苟。他书法秀拔,分析透彻。他对学生要求严格,经常随时提问。虽不曾批评过哪一个,但从他的脸色、眼神可以看出对学生的回答是不是满意,因此,学生有些怕,在整个学习过程中,大家都兢兢业业,阅读有关资料,思考问题,不敢稍有懈怠。”

朱自清在辞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之际,呈递了两份辞职报告。第一份,朱自清本人提出辞职理由外,还附有简短的期望话语:高尔基说,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图书馆里每本书都是有生命的,充满活力的,是知识健康的窗口,是眺望未来世界的导航仪。书本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精神食粮,也提供给我们如何做人的道理——正直、善良、关爱等人性美的元素渗透到书本里,渗透进我们的灵魂中,这样读书才有意义。第二份,是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名录,在名单下有注解:我不能让有生命力和活力的书本遭到病菌侵袭,无疾而终。这个管理员因为不称职,所以在我辞职之际也一并将他辞退。我离开后,不能拍了屁股一走了之,因为我明白,我不能将‘带菌’人员继续留下来,让我充当‘健儿’,让下一届的新任馆长唱黑脸戏,让他当‘恶人’。

◎ 史林偶拾

触动钱学森的一句话

□ 张达明

在许多的报道和回忆文章中,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,实际上,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时,浑身充满着一股“外国作风”,在待人接物上不懂得委婉。

戴汝为于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,拜钱学森为师。一次,戴汝为去图书馆查资料,巧遇也在查资料的钱学森,便上前毕恭毕敬地问道:“钱老师,我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呢?”不料被钱学森硬邦邦地顶了回去:“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,这个小事用不着来问我。”戴汝为涨红了脸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戴汝为曾试图向钱学森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,却被当面严厉指责:“你的表达没有一点条理性,我一句也没听懂,还是弄懂弄通了再找我。”多年以后,戴汝为已经成为中科院院士,他在回忆那段往事时说:“钱老师当时确实很严厉,我时不时还会想起被他‘刺’的那种脸红的感觉。”

北大数学系的一位副教授,去钱学森的办公

室请教问题,虽然有椅子,但钱学森却不请对方坐下,副教授只好站在那里诚惶诚恐地谈了十几分钟,谈完后,钱学森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话:“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懂?你这个副教授是怎么当的?”副教授尴尬得不知所措,向钱学森鞠了一躬后仓皇离去。

当时,钱学森的秘书张可文恰巧在屋外看到了这一幕,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一下钱学森要适应国内的人情世故,不能动不动就让人下不来台,于是便委婉地对钱学森说了一句话:“树有皮,人有脸。”钱学森听后猛然抬起头,盯着张可文足有十几秒,这才低下头沉默不语。

从那以后,张可文发现,钱学森一改动不动就

尅人的做派,从此变得温和谦逊起来。

钱学森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说:“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,她那句‘树有皮,人有脸’的提醒,对我触动很大,让我明白了人与人相处的最高境界是尊重,你尊重别人,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,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所以说,我很感激她。”

鲁迅挑刺错别字

□ 王吴军

鲁迅写过这样的一首诗:“可怜织女星,化为马郎妇。乌鹊疑下来,迢迢牛路路。”这首诗是讽刺当时一位主张翻译“与其信而不顺,不如顺而不信”的文学青年的。这个文学青年把“银河”错译为“牛奶路”,还在译文中把“马”“牛”相混。

后来,这个文学青年在上海大中华饭店举行婚礼,鲁迅亲自前来贺喜。

做作的晚清四大日记

□ 李健

晚清四大日记是李慈铭的《越缦堂日记》,叶昌炽的《缘督庐日记》,王闿运的《湘绮楼日记》和《翁同龢日记》,清史研究者从中发现了大量正史野史所不载的珍贵史料。如《越缦堂日记》就记载了主人从咸丰到光绪的40年间大量的治学札记、朝野见闻、朋友聚散、人物评述、书画鉴赏、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。即便如此,因为这些日记经过作者与书商一次次的整理、修订,等到公开面世时,许多真实的信息已被删改过滤了。鲁迅先生评价道:“《越缦堂日记》近来已极风行了。我看了却总

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。为什么呢?一是钞上谕……二是许多墨涂……三是留给人家看的,自以为一部著作了。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,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。”

当下出版的名人学者日记普遍存在类似的毛病,不是后人为前人隐恶扬善,修改粉饰示人;就是书商不愿意是生非,为尊者讳,删减墨涂;或者如鲁迅先生所言那样,该日记写的时候就是准备留给别人看的,尽是些虚浮夸夸的自恋滥词。因此,在阅读这样的日记时常会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,找寻不到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,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。

不攻击前任

□ 唐宝民

滕宗谅是北宋时期的一名官吏,曾任湖州知府一职,在任上,为了集资办学,花费了民钱数千万,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,他就被调离了。接替他任湖州知府的人叫胡宿,胡到任后,开始接手集资办学一事,这时,滕宗谅的那些下属便纷纷在胡宿面前说滕宗谅的坏话,说这笔款出人不明、账目不清……显然,这些人想通过说前任的坏话来讨新任领导欢心,他们以为胡宿听后一定十分高兴,哪知胡宿却说:“滕侯这样做确实不合适,但他任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说不呢?当面不提,人走之后再

说人家的不好,是何道理?”众人听了,都十分羞愧,便不敢再说前任领导的坏话了。

李沆是宋朝大臣,也是个不喜欢攻击前任的人。李沆曾经与胡旦共过事,后来,胡旦被朝廷贬

官到了商州,而李沆则被升为宰相。胡旦得知李沆升任宰相的消息后,就想通过李沆的关系重新得到起用,于是便给李沆写了封信,为了讨李沆欢心,他便在信中向李沆的前任大加贬损,并对李沆极力赞颂。胡旦以为这样一来,李沆心中一高兴,就能推荐自己。哪知,李沆看完信后,生气地说:“我真比那些前任都优秀吗?也不过是偶然得到机会罢了。在人家的后面接任而要说他们的坏话,这样的事我做不出来!”因此,在李沆当宰相期间,就一直没有起用胡旦。

一般来说,新任官员都喜欢别人把前任贬得一无是处,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优秀。但胡宿和李沆却不是这样,当别人在他们面前说前任的坏话时,他们理性地阻止了别人,显示出了难得的修养和为人境界。

◎ 老照片

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

民工围观黑板报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黑板报是一种常见的群众性的宣传工具,它在学校、工厂、农村、街道等有广泛的应用,黑板报还与干活的农民一起走向了田头、工地,及时告示上级重要通知、劳动进度、表扬好人好事等。图为1978年在开挖杭嘉湖南排出海工程长山河工地上,民工们正在观看新编写出来的黑板报。

照片提供者:朱积良

◎ 文化史谭 □ 张勇

朱自清先生为人、为文、教书育人,都讲求一个“真”字。

1927年,朱自清写下了著名散文《荷塘月色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,没精打采的,是瞌睡人的眼。这时候最热闹的,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……”

上世纪30年代,一位叫陈少白的读者写信给朱自清,质疑其中的描写失真,他认为蝉在夜里是不叫的。为此,朱自清请教了昆虫学家刘崇乐,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,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。几天后,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给朱自清,抄文显示,平常夜晚,蝉是不叫的。朱自清在给陈少白回信时说,自己请教了昆虫学专家,专家和你的看法一致,蝉在夜晚是不叫的。并表示如果以后《荷塘月色》再版时,要删掉月夜蝉声的句子。但朱自清还是心有不甘,自己注意留心观察,因此便常常在夜间出外,在树间聆听。不久,竟然两次在月夜听到了蝉的叫声。这足以证明:蝉在夜里其实是叫的,他在《荷塘月色》中对夏夜蝉声的描写并没有错。

其实,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在《西江月·夜行黄沙道中》就有这样的句子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”,表明夏夜是可以听得到蝉的叫声的。陈少白仅凭自己一个晚上一时的经验,就判定晚上蝉不叫显然是错误的。1948年,朱

自清专门写了题为《关于“月夜蝉声”》的短文,感慨道:“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。例如,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,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,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。其实是成见。这种成见,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,或加以歪曲的解释。我自己在这里是个有趣的例子。”

朱自清对待写作一丝不苟,教书也十分严谨。他的学生陈天伦回忆:“朱先生来教国文,矮矮的,胖胖的,浓眉广额,白皙的四方脸。经常提一个黑色皮包,装满了书。不迟到,不早退。管教严,分数紧,课外另有作业,不能误课,不能敷衍。最初我们对他都无好感,至少觉得他比别的先生特别啰唆多事、刻板严厉,但他教书的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,别致而善诱。”

据弟子王瑶回忆,他当年上朱自清先生的“文辞研究”课,由于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,内容比较枯燥,没有什么人上这门课,当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,尽管如此,朱自清仍然坚持开课。朱自清一向十分自律,当时他在昆明五华中学兼教一班国文,一次西南联大临时开会不能分身,他一早专门赶到五华中学请假,此事给许多人留下很深印象。

在西南联大时,虽然条件异常艰苦,但朱自清对教学仍然一丝不苟。据冯钟芸回忆:“佩弦先生常任单身教师宿舍,朱师母和孩子们远在成都。他多年来吃发了霉的陈仓老米,胃病常犯,病了也得不到调养……我读了他开设的‘中国文学批评’等两门选修课。记得听课的有七